

836

12265.306
949

火 刑

——日本战犯供述档案揭秘

公安部档案馆 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火刑：日本战犯供述档案揭秘/公安部档案馆编.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1
ISBN 7-81087-169-2

I. 火… II. 公… III. 日本-侵华-档案资料
IV. K265.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6227 号

火刑——日本战犯供述档案揭秘
HUO XING——RIBEN ZHANFAN GONGSHU DANGAN JIEMI
公安部档案馆 编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10003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鑫正大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1 月第 1 次
印 张：13.375
开 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 数：315 千字
印 数：0001~3000 册

ISBN 7-81087-169-2/D·179
定 价：22.00 元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发行部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010) 8390572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E-mail: cpep@public.bta.net.cn

《火刑——日本战犯供述档案揭秘》

编 审 人 员

审 稿：王亚东 李热辉 李淑芬
编 撰：徐雅雅
校 核：陈亚平 许翠玲 康 宁
 孙树民 于冬燕等

编 者 的 话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这曾经激荡在中国大地山川的歌声并没有随着历史的烟云淡淡而去，中华民族不会忘记上个世纪的那场气壮山河的抗日战争！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各族人民广泛参加的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共毙、伤、俘日军128万余人。中国人民伤亡3120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380万余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战场是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要战场，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

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1945年8月英国、美国、法国、前苏联通过的《欧洲(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和1946年1月美国、中国、英国、前苏联、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国通过的《远东(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规定，战犯应负个人刑事责任。并根据这两个宪章的规定，组织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军事法庭，对德、日首要战犯进行了审判。随后，前苏联、中国也分别在本国组织军事法庭对部分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

据曲初同志(男，山东省威海市人，1915年出生，1940年9月参加革命，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副所长)回忆，1950年初，新中国第一任司法部长史良在与他谈话中说：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访问了前苏联。此间，苏方决定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俘虏、关押的，在中国犯有战争罪行的上千名日本战犯和伪满战犯全部移交给我国，由我们作为主权国家自行处理。由于关内各地基本上是新解放区，东南沿海各岛和西藏等地还没有解放，美帝国主义又在朝鲜半岛蠢蠢欲动，鉴于东北地区基本上是老解放区，所以中央决定，在抚顺也就是东北司法部直属第三监狱成立东北战犯管理所，此后不久，中央为更有效地管理和教育这批战犯，采纳了史良部长的建议，决定由中央公安部和东北公安部主管战犯管理所工作，中央司法部和东北司法部负责协助配合。战犯管理所所长一职由东北公安部调派。

金源同志(男，黑龙江省人，1926年4月出生，1946年参加革命，1950年6月调入抚顺战犯管理所)亲历了教育、改造日、伪战犯的全过程，他在晚年和战友们一同回忆了那段难忘的人生经历……

到1950年的7月中旬，战犯管理所所需的100多名干部和一营警卫部队就由东北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和公安三师配齐了，

在旧监狱基础上改、扩建的战犯管理所也竣工了。同年7月21日凌晨3时，押运969名日本战犯的专列到达了抚顺车站，从车站到管理所约2.5公里路，我一个营的兵力沿途布哨，几乎是10米一岗。除老迈及病号乘车外，战犯们一律步行至管理所。曾几何时，这些当年不可一世的军国主义分子，竟也被押进这所当年用来囚禁屠杀中国爱国志士，被称做“抚顺监狱”的高墙深院里。这批前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移交的969名日本战犯中，将级或相当于将级的31名，校级或相当于校级的210名，余下的728名为校级以下。他们中有伪满洲国行政官吏36名，日籍警察人员137名，日籍特务12名，日本宪兵113名，伪铁路警护人员56名，日本军队人员589人。这些战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期间，都犯下了各种罪行。例如，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武部六藏和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操纵伪满傀儡政权与日本关东军结为一体，疯狂推行侵华政策，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旷古未有的深重灾难；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指挥其部下到处建立“无人区”，曾多次制造了大惨案，杀人3万多名，烧房2万多名，等等。这些罪恶深重的战犯刚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时，态度极端傲慢顽固，他们蔑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常公开地为其侵华战争行为辩解，说什么“为日本民族的生存争取空间，向外扩张是不得已和正当的”；认为“战败并不是日本军队不强，而是战线太长，物资供应不足，是在战略上犯了错误的结果”；有的还胡说什么“日本大和民族是优等民族，有义务指导劣等民族”，等等。前日本陆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是日本青森县人。他出身于一个封建武士家庭，从小受日本军国主义熏陶，立志从军，后成为一骑兵军官。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紧接着，侵华战争全面展开。战争末期，藤田茂已担任日本中将师团长的职务，向我国山东省一带猖狂进犯，施展淫威，穷凶极恶地大抓劳工，掠夺财物，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他曾下令日本士兵拿我国活人作试胆训

练，使许多中国人惨死在日本士兵的刺刀之下。这充分暴露了藤田茂凶狠残暴的刽子手本性。在日本军人中有“鬼将军”的绰号。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骄横一时的藤田茂被俘并被关进了前苏联伯力收容所，当他得知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将东条英机等7名日本甲级战犯处以绞刑时，他曾确信“复仇是一切动物的本能”，决心以死效忠于天皇。

1950年7月21日，藤田茂随其他日本战犯被移交给中国。他走进抚顺战犯管理所时，身穿将校服，肩佩军阶，足蹬马靴，依然是昔日践踏中国国土时的凶神派头。并曾表示“宁愿为天皇而死，也要为国复仇”，是在押的日本将校级战犯中态度最顽固的一个。当然，与此同时，他们也顾虑重重，时刻担心自己会被处决。管理所修建锅炉房，他们怀疑是盖“杀人房”；安装医疗设施，他们以为要拿他们作“细菌试验”；让他们登记自然情况，他们以为是“验明正身”而不敢填写真名实姓。经过一段时间，日本战犯感受到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和人道原则，也看出短期内不会把他们“处死”，情绪开始稳定下来，但根深蒂固的“世界优等民族”的观念又有抬头。下面一段对话是一个被战犯们称为“大和魂的榜样”的日伪时期的警正（简称：犯）向我管教人员（简称：管）的一次挑衅：

犯：我是来中国帮助维持治安的，你们为什么关押我，不让我回国？

管：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请你来帮助维持治安的？

犯：我是奉天皇的命令来的。

管：天皇是日本的，你们日本的天皇为什么要管中国的事？你应该知道，你正是因为是在侵华战争中忠实地执行了日本天皇的侵略政策而成为战争犯罪分子的。

犯：你们是战后新成立的国家，无权关押我们，你们违犯国际法。

管：你懂国际法吗？国际法哪条规定，一个国家可以侵略另一个国家？要知道，违犯国际法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新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有权关押、处理你们。我们这样做也是符合战后联合国的协议和国际法的。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唯一出路是必须认罪服法！

从以上对话可以想像，要对这批日本战犯进行教育、改造，是一项多么艰难、复杂的工作。正如毛泽东同志分析的那样：“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其因过去没有打过败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对天皇和对鬼神的迷信，其傲慢自尊，其对中国人的轻视等等特点，这是日本军阀多年的武断教育和日本的民族习惯造成的。”

针对这个特点，抚顺战犯管理所引导战犯们思考三个问题：

——是谁把你们推上了战争罪犯的道路？

——应当怎样看待战时的日本天皇？自己怎样充当了天皇的牺牲品？

——怎样才能结束监禁生活，走上新生之路？

二

本书内容来源于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部分日本战犯所写的供述材料，这些由发自内心的忏悔而凝聚成的供述是怎么得来的呢？我们不能忘记当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过的公安战士们所创建的丰功伟绩。那些被我羁押的日本战犯，虽然不能称为日本侵华战争的主要责任者，但他们在侵华战争期间，都曾违背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对我国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尤其是那些高级将领。仅据已查悉的战犯的几项主要罪行的极不完全的统计，在他们的主谋或参与之下，烧毁和破坏房屋，掠夺粮食、煤炭、钢铁，杀害我国和平居民和被俘人员，并制造了潘家峪、北疃、巴

木东、三肇等30多起重大惨案……这些战犯对中国人民欠下的血债，可谓罄竹难书。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这批罪孽深重的日本战犯将怎样惩处，曾经牵动着千万日本国民的心，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中国人民有着伟大的胸怀，中国政府站在历史的高度，洞察、分析和处理近代100年来中日关系，针对改造战犯而制定了一套令世人瞩目的政策和办法：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原则，对战犯开展悔罪认罪教育，组织战犯到社会上接受教育，依法侦讯、严肃追究罪行，并对日本战犯实行“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的宽大处理政策。这些政策的成功实践，令“鬼”变成了人，用战犯们的话说，他们从中国得到两件宝贝——新的生命和真理。

1956年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最高人民检察院于同年6、7、8月，先后分三批对在押的1017名（包括太原战犯管理所所关押的人数）职务较低、罪行较轻、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宣布免于起诉，立即释放，由中国红十字会移交日本红十字会乘船回国。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罪行较重的前日本陆军中将铃木启久、藤田茂、佐佐真之助及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武部六藏等45名日本战犯，在沈阳、太原进行了公开审判，分别判处8至20年有期徒刑。这些人除佐佐真之助在服刑期间病亡之外，其余44人到1964年3月6日止，也都刑满释放或提前释放，回归日本国。

这些重大消息，当时震惊了全日本，也震撼着全世界。一时间，各国新闻媒介都及时作了报道。有些新闻报道还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自1946年5月3日始至1948年11月12日止，历时两年半所进行的历史上最长的一次审判相对比，提出：为什么被远东国

际军事法庭审判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竟没有一人服输认罪的，而中国审判的这批日本战犯却都乞求法庭为自己加刑或处以极刑？这里用两位亲历者的切身体会来回答吧！

当时被中国政府免于起诉、后来曾任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会长的富永正三(1914年5月生于日本熊本县，1939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农业经济系，1940年2月入伍，1941年7月随日本陆军第39师团入侵中国，历任见习官、中队长，1945年8月在中国东北开原县被苏军俘获，押至前苏联，1950年7月由前苏联政府移交中国)说：回顾过去脱胎换骨改造思想的道路，是何等严峻而艰难。在1950年7月，作为对中国犯有侵略罪行的日本战犯，于中苏国境线上的绥芬河由苏军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时，我们都曾想过，一定会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报复，再也不可能活着回日本了！可是，出乎意料，抚顺战犯管理所对于我们丝毫没有报复的态度和侮辱人的言行。那时，我们并没有轻易地相信这种革命人道主义政策，然而，中国政府一贯的人道主义政策使我们受到了教育而深为感动，渐渐地恢复了做人的良知，从而觉悟到自己在过去惨无人道地杀害中国人民的可耻罪行。在这期间，经过了长期的学习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在相互揭发和自我批判的基础上，终于都自觉地坦白出隐瞒的罪行，尽管各自的悔罪情况有所不同，但普遍认为接受任何惩罚都是理所当然的。

首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的孙明斋(男，山东省海阳县人，1913年11月出生，1941年参加革命，1950年6月调抚顺战犯管理所)回忆道，他的一家在日寇侵华的掠杀下，房子被烧、东西被抢、舅舅被日本狼狗咬死，他还目睹了乡亲被杀和一位母亲被日本兵用刺刀挑死，又把心脏挖出来煮着吃掉的惨烈情景。当东北公安部领导接见已任战犯管理所所长的他，并问他对工作有没有信心时，他因想到负责管理当年穷凶极恶的强盗而愤愤不已，表态时有点支支吾吾。这位领导语重心长地说，管理教育日本战

犯，前人没有先例，今人没有样板。党既然已把改造这批战犯的任务交给了我们，那就是说，党相信我们会把这批战犯管理教育好。

一句“党相信我们”，如同拨亮了灯，指明了路。战犯管理所的干部、战士们一切以党的利益为重，尊重战犯的人格，不感情用事，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战犯管理所仅为保障战犯们的伙食标准和各种生活、学习用品，每月要花掉几亿元(东北币)，每月都要到银行提取满满一吉普车的现金。当时有规定：拨给战犯用的生活费不准节余上缴，必须按标准花掉，保证战犯“吃到口，拿到手”。抚顺战犯管理所对在押的日本战犯在生活标准上按国际惯例处理，依据战犯原来的级别，参照我军的供给制标准，按将、校和校官以下三个级别，分成小、中、大灶三种待遇，全部供给细粮。对在押战犯既要做到不跑一个，不死一个，又要做到不打不骂，不侮辱人格，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注重从思想上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本书中有三篇供述材料对此有细腻的描述，分别是佐野一的《手》、小川仁夫的《我的窗台》、集体所写的《新屯疗养所》。分别从个人或群体角度，小中见大、丝丝入扣地描述了在战犯管理所的生活和在有关医疗机构疗伤治病期间艰难的思想转变经过，赞扬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及有关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身上那种崇高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尤其是我教育改造政策强大的感召力。

从1950年7月到1964年3月，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日本战犯的教育改造工作，经历了近14年的时间。这期间，一直坚持把思想改造放在第一位，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政治斗争与革命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政策，整个学习、管理、劳动都以转变战犯的反动立场、观点为出发点和归宿。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这批日本战犯终于在政策感召下，改造成为新人！

1964年，毛泽东同志在一次接见外宾时，曾介绍了我国改造日本战犯的情况。他说，那些打中国的将军们，经过教育，除一人外，都不反对我们了，而变成中国的朋友。在日本国内，他们还进行宣传，反对他们的垄断资本和美帝国主义。同年，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改造战犯经验时指出，在敌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以后，敌人中的绝大多数是可以改造的，但要有好的政策，好的方法。要他们自觉改造，不能只靠强迫、压服。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中，逐步摸索，积累了一套正确、先进、独特、成功的改造罪犯的经验，不仅创造了国际战犯审判史、改造史上的先例，而且为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力促重建中日和平友好关系，防止历史悲剧重演而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

那位“鬼将军”藤田茂怎么样了？1956年6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铃木启久等8名日本战犯宣判，判处藤田茂有期徒刑18年，他痛哭流涕地表示：“若论我的罪，判几个死刑，也不能赎罪于万一。然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却表现了如此宽宏博大的胸怀，赐予我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一定要认罪服刑，努力做个真正的人。”后考虑到藤田茂的良好表现，1957年9月，他被提前释放回国，他晚年致力于推进中日友好事业，曾四次来中国。1982年，88岁的藤田茂在弥留之际，特意嘱咐家人给他穿上周恩来总理所赠的中山装，这才溘然离世。一粒米见大千世界，从藤田茂由“鬼将军”到“友好使者”的翻天覆地的转变，可见有中国特色的改造罪犯的方针、政策之一斑。

建立于1950年7月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因教育改造战犯成效显著而享有盛名。1975年，该所随着关押改造战犯任务的结束而撤销，现旧址对外开放，供人参观。

三

公安部档案馆于2002年开始了对原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档案的编研工作，其中一部分便是把日本战犯们撰写的供述材料编辑成《火刑》一书。战犯们在书中不少段落从各自的视角描绘了中国人民的反抗。这种反抗精神使侵华日军魂飞胆丧，激励着一代代中华民族的每个儿女。今天读来，仍然令人警醒。

我们从浩如烟海的馆藏档案中，把这批供述材料发掘出来，公诸于世，可谓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做一点贡献。参加本书编审的同志有王亚东、李热辉、李淑芬、许翠玲、康宁、孙树民、于冬燕等，本书“编者的话”、“后记”和在尊重译稿基础上的文学加工由徐雅雅完成。由于经验不足，欠妥之处，请广大读者指正。

2002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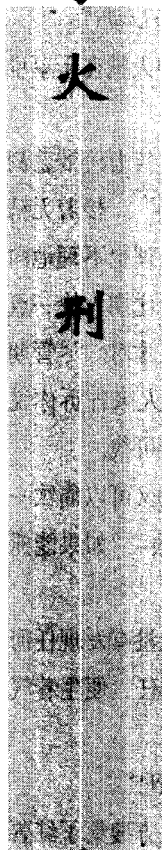
CONTENTS

目 录

编者的话

- | | |
|-----------------|-------|
| 火刑 (1) | 藤田秀夫 |
| 鬼和少年 (10) | 重永悦美 |
| 一个老军曹的面子 (21) | 江先光 |
| 手 (40) | 佐野一 |
| 用军犬虐杀 (56) | 桥本今朝三 |
| 野兽和馒头 (64) | 矢野升 |
| 阵中日志 (78) | 船生退助 |
| 双木偶 (89) | 田村贞直作 |
| 试验步枪 (98) | 权田敬之助 |
| 家信 (114) | 佐古龙祐 |
| 在那条山边的小路上 (128) | 尾形保之助 |
| 驻防 (134) | 有山彦次郎 |
| 好大的棺材 (143) | 久保田哲二 |

我的窗台 (155)	小川仁夫
手戳 (214)	入户野梅男
洞 (239)	鸭田好司
不可征服的村庄 ——白杨寺村 (247)	入户野梅男
斩萝卜 (253)	小泽又藏
翻译 (261)	西尾克己
愤怒的天史庄 (270)	岩濑四郎
向黎明祈祷 (275)	“向黎明祈祷”集体写作小组
新屯疗养所 (349)	“新屯疗养所”集体写作小组
后记 (405)	



作者：藤田秀夫 第四五八号

原所属：原五十九师团五十四旅团独立步兵第一

○九大队二中队

阶级：陆军上等兵

职务：指挥班员(步枪手)

年龄：三十四岁

时间已经是五月底了，但湿润的田地还是有些冰凉，雨停云也散了，午后的太阳暖暖地普照着。马耳山耸立在山东省的东北部，一座一座的山峰荡漾着白白的云雾。山间的村庄看样子约有七八十户人家，非常寂静没有一丝声音，连一条狗都看不见。在村庄的一个角落，孤零零地立着一户门朝南开的农户，不一会儿，有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太婆向四面八方担心地张望一番后，摇晃着缠足开始在园子前面的田地上急躁地来回踱着。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二百名左右的日本军沿着东边的山峰，闪耀着刺刀冲入了村庄。

我们接到旅团的命令：今天晚上在这村庄宿营。中队的便占用了村庄中心的大房子。照例开始杀猪抓鸡准备晚饭，和平寂静的村庄立即充满了

哦——哦——的猪临死前的哀叫。正在这热闹的时候，指挥班长濑利准尉集合了我们指挥班员传达了中队的命令：

“各小队在一小时以内‘别抉’（搜索）村庄，集合居民查明八路军的去向和物资隐匿的地点。藤田上等兵以下四人立即准备出动！”

“又叫我去了。”我皱着眉头回到屋子，懒洋洋地仰天躺在干草堆上。

“报告藤田上等兵，准备完了！”柳田一等兵以下三名士兵带着刺刀、扛着枪向我敬礼报告。我仰天躺着，朝屋顶回答“好”，接着无精打采地站起来，带上刺刀，腰上挂了一个手榴弹，对新兵理也不理地向村庄的南面走去了。我想，反正来到了这个村，应该赶紧比别人快一点取得八路军的线索，搜集一批武器，使肩章能增加一颗星才对。尽管期待是这么大，但事实并不这么简单，哪里有这样傻瓜的人来告诉你说“我知道八路军在什么地方”。隐匿的枪支也是同样无处可找。

“作战快要结束了，要是捞一把值钱的东西回到济南又可以痛饮一场啦……”我打算胀满自己的腰包，于是又嬉皮笑脸地想：“如果能抓到一个年轻的姑娘真不错啊。”

我粗暴地吩咐新兵搜遍了許多房子，到处翻箱倒柜也没有发现任何称心如意的东西。我越来越不愉快，好像这都是新兵的责任，便生着气乱骂：

“柳田！你们这些东西，傻里傻气的什么东西都找不到！”

叫我们空手回队也是不愿意的，我促使他们从四面八方搜集了红薯干装在面粉袋里，命令在三十九岁时曾经在富山县当过市会议员的柳田一等兵背上，从村边踩着田地往回走了。

本以为一个人也没有，突然在南面角落的一所孤独的房子前面发现